



回望《益世报》追悼鲁迅先生

孙玉蓉

今年9月25日,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纪念日;10月19日,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祭日。回望90年前天津《益世报》追悼鲁迅先生的往事,感知天津报人对鲁迅先生的敬重与哀悼,藉以纪念鲁迅先生。

1936年10月19日清晨,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。次日,《益世报》便开始全方位报道上海筹办鲁迅后事的系列消息,以及北平学界与文化名人的反响。《益世报》副刊编辑立即向文坛著名学者、进步青年约稿,并于11月1日出版了《益世报增刊》“追悼鲁迅先生专页”,刊发了朱自清、叶公超、许寿裳、黎锦熙、梁实秋的文章和许丹的诗《哭周豫才兄》。

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是朱安女士的亲戚,与鲁迅先生只见过三次面。鲁迅逝世次日,他到北京西三条胡同21号寓所慰问朱安,并在日记中写道:“昨日鲁迅先生逝世。”“吊慰鲁迅太太。”24日,他在清华大学“参加鲁迅追悼会,并发表演说”。而他在《益世报》发表的悼念文章《鲁迅先生会见记》,竟然成为他的集外佚文,未能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12卷本《朱自清全集》。虽然《鲁迅先生会见记》曾被改题目为《我和鲁迅》,收入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版《鲁迅先生轶事》一书中,但是朱自清《日记》中并无记载,或对此

事并不知晓。

北京大学教授叶公超是新月社成员,与鲁迅先生没有交往,但是,他在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一文中,从学术角度,充分肯定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。

许寿裳是鲁迅先生的老友,他在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一文中,以鲁迅作品为例,阐明“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,眼光极敏锐,心极细而胆极大。他敢正视人生,冲破黑暗,指出国民性的缺点”。他的伟大之处在于“他敢猛烈地攻击虚伪”,“揭穿假面,毫不留情”,“主张韧性的战斗”。许寿裳号召读者:“当此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,愿我国民一齐奋斗,汉奸自然应该打倒,逸民气也万不可有,这才是真正的纪念鲁迅!”

北京大学教授梁实秋也是新月社成员,曾与鲁迅先生论战数年。鲁迅逝世后,他应编辑之约,寄来了态度平和、言辞中肯的纪念文章《关于鲁迅先生》,他承认鲁迅“先生在文学方面,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,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,而其文笔之卓绝,则实令余钦佩。现先生逝世,为中国文坛上之最大损失,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”。他希望鲁迅先生的亲友赶快“搜集鲁迅先生的信札遗稿”,“编写一部详尽的传记”,“编印他的全集”,他说:“有许多材料不早着手整理就容易散佚。我盼望鲁迅先生的亲友不要忽略这一点应尽的义务”。梁实秋的这篇文章,至今少有人谈及。

此外,同一天的《益世报·文艺周》副刊,同样是“追悼鲁迅先生专页”,刊发了周学普、王余杞和王亚平的悼念文章。周学普是山东大学外文系教师,写作了《悼鲁迅》一文。王余杞是一位多产的左联作家,抗战前在天津工

作生活七年,曾创办《当代文学》月刊,刊发左翼作家作品,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。他描述天津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《海河汨汨流》就是在《益世报·语林》副刊连载的。他在《悲愤——因鲁迅先生的逝世而作》一文中,忆述了1929年8月9日,他利用在沪宁铁路局实习之机,经郁达夫介绍,到上海闸北的景云里拜访鲁迅先生的往事。他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思想界、文艺界唯一的巨人,“这个巨人,他曾为大众尽力,大众必然对他永世不忘;他将与大众同在,永无穷期”。王余杞的预言早已变成现实。

王亚平是现代著名诗人,他在《为追悼鲁迅先生更进一解》文章中,从伟大的人格、著述的勤苦、热诚与胆量三方面,谈了对鲁迅先生的认知,他说:“我们要把他这种过人的光荣、伟大的精神,发扬光大,使不死的人好警惕自己,做为大家的师范,继续他开辟的血路,一致团结向前进发。”此文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《王亚平选集》,在《王亚平年谱画传》中也未曾提及,应该是集外佚文了。

1936年11月2日,《益世报·文化生活》副刊,发表了清华大学学生魏东明的《纪念鲁迅先生》、北京大学学生魏伯的新诗《悼鲁迅先生》,均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敬重与惋惜。抗战期间,魏东明与魏伯肩负着时代使命,投身革命文艺工作,成长为解放区文学作家,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对青年人寄予的厚望。

以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,数篇哀悼文章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,但是,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他的景仰。报纸是注重新闻性、时效性的,终因版面所限,有些悼念文章未能刊发。编辑表示“代为保存”,待鲁迅先生周年祭时,“还要借重”。不曾想次年抗战爆发,天津沦陷,《益世报》被迫停刊,编辑的愿望就此落空。

●柳墅行宫话沧桑

寻迹乾隆首次驻跸

曲振明

柳墅行宫正式接待皇帝是乾隆三十二年(1767)三月。这一年,乾隆巡阅海河、子牙河水利,查看河堤淀闸,顺便驾临天津。

早在一年前,清廷的大臣们就负责安排这次出巡天津,长芦盐政高诚奏报了准备情况。这一年农历二月,乾隆自圆明园启程,经过陆路水程,各地方官预备数处“以供憩顿”,由长芦盐政解内务府银两三万,以为办差之用。

《天津县新志》载:“乾隆三十二年三月,高宗巡幸天津,周览淀河堤闸。驾莅新城,阅水师营满洲兵,以其弓马及国语生疏,悉裁汰之,命议都统各官罪;莅海光寺,阅绿营兵;恩恤长芦盐商,赏赉珍物;诏免本年钱粮十分之三,豁免积欠银谷。”

乾隆视察了天津周围的淀河堤闸,在观看大堤图纸时,发现千里长堤自三摊里起至格淀堤庄儿头止,中间并无堤岸,于是询问直隶总督方观承。由于每遇淀水泛滥,农田、民居无不淹没。于是乾隆派阿里衮分道查勘,发现无堤处长约十余里。于是让方观承接筑长堤,务必在汛前完竣,并飭子牙厅和天津道前来督察。随后乾隆与皇太后乘舟到了天津。

乾隆首先到天津府城,接受地方官和盐商的迎接,然后前往柳墅行宫,只见建在海河岸边的行宫门口处,聚集了上万名夹道欢迎的老百姓。他走在长长柳径之上,跨入偕乐堂,遂写了一首诗:“行宫海河上,颜之偕乐堂。无过停信宿,颇觉费磋商。拥马万民近,入门一径长。顾名思义托,九字富耕桑。”乾隆钟情于柳墅行宫的景色,题诗“烟意柔条挽,露光嫩蕊匀。向花开户牖,把卷异舫舫”,感慨此处起居,远别于昔日御舟中的光景。乾隆到柳墅行宫正逢清明,此时北方难得有雨,而乾隆到行宫,雨风皆有之。清明宜晴不宜雨,到了傍晚风息而雨还下。到了第二天,“晨起犹阴旋放曦”,天放大晴。乾隆喜忧参半,“一以为幸一以惜,惟是筹农无射思”。

此次天津之行,乾隆还到天津水师营检阅满洲的旗兵,发现这些旗兵技艺平庸,不能操习官话,此前曾赏赐战马400匹,“而两翼队内并无骑马者”,问原因,称怯弱不能骑,故以步下演习。乾隆十分气愤,将都统富当阿交军机大臣议处。最后决定水师营兵丁移拨福建、广州、凉州等处,都统富当阿、副都统雅隆武等奉旨治罪。同时告诫各省“若复如天津颓靡,一经查出,唯将该将军大臣等从重治罪,绝不轻贷”。乾隆还到海光寺检阅了绿营士兵。

乾隆首次驻跸柳墅行宫后,对长芦盐商协助办差十分满意,决定将每年十月的长芦通纲盐课,改至十一月底奏销,以示体恤。

摇摇摆摆

由国庆

一个人如果做事、决断时举棋不定、立场不稳,常被称为左右摇摆或摇摇摆摆。这个词的典故早在元代公案戏中就出现了。

元代杂剧《陈州糶米》全名为《包待制陈州糶米》,是写陈州地方大旱三年,六料不收,朝廷派往陈州开仓济民的官员乘机贪赃枉法,盘剥百姓,如第四折里表述:“我做个州官不歹,断事处摇摇摆摆。”

现代生活中也常有此类事。胡同里的二丫头同时谈过两个对象,一个是文书生,一个是小老板,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,她心思摇摇摆摆,看上去还挺伤脑筋的样子,却全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……俏皮话“风吹杨柳”“风吹芦苇”“脚踏擀面杖”“脚踩两只船”等也皆有近似的意思。



●老街角掠影

张建文并摄



该街角位于现鞍山道与甘肃路交口。主建筑为三层,局部四层楼房。原为日租界官岛街与淡路街交口的日本商业学校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为教育学院使用,后改成和平区考试中心。现为汇文中学校舍。

照片摄于2012年11月

●老口福

酸辣土豆丸子

杨世珊

上世纪70年代末,农村已走向富裕,土豆等农作物产量比较大,卖不出去,无处可送,麻利三嫂子便想着法儿地把土豆做出“花儿”来。除炒土豆的常规做法外,还有蒸土豆蘸花椒盐

儿、煮土豆拌麻酱或面酱等好多种新花样,其中的酸辣土豆丸子,值得在此说一说。

麻利三嫂子先将土豆刮皮、洗净、切片,上锅蒸到用筷子一捅可扎透便停火取出,晾凉之后,用勺连碾带压,使其软烂成泥膏状,搁点盐,增加底口儿,随后再分多次加入红薯淀粉,将土豆泥调到软硬适中,攥成核桃大小的球。接着起锅烧水,水开后放入土豆丸子,待丸子漂起捞出放进凉水盆中,

如此一激,土豆丸子紧实成形,不至于软塌松散,捞出后盛盘备用。

另外取出一只碗,放入辣椒面儿、葱姜蒜末,倒入热油激出香味儿,淋清酱,多放一些醋,搅拌均匀。最后放芝麻、白糖以及一把芫荽叶儿,料汁就调好了。

将料汁倒入晾凉的丸子中,搅拌均匀,使每个丸子都裹上料汁,丸子红彤彤的,料汁香味浓郁,吃到嘴里,酸、辣、香、甜、糯、绵,令人回味无穷。